

# 反思与超越: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基础

李世闻,谢先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要建设具有高水平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实现思维方式和一系列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从机械论思维方式走向系统思维方式;从“控制自然”走向“尊重自然”;从物质享乐主义的“物质至上”价值观走向“精神至上”价值观;从“增长至上”的发展观走向科学的发展观;从“奢侈性”消费走向适度消费。

**关键词:**机械论思维方式;控制自然;“物质至上”;“增长至上”;适度消费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5 - 0008 - 06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的收入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实现了初步的小康。但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不再适合人生存的状况。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全面小康的重要内容。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建设具有高水平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实现思维方式和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

## 一 从机械论思维方式走向系统思维方式

在以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为特征的现代文明中,机器不仅是这种文明的核心,还成了人的崇拜物。生产的机械化一经启动,便与认识的机械化、思维方式的机械化之间形成了日趋强化的正反馈体系,使得机械论思维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成为社会的主导思维模式。有的学者指出这种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理性至上、心物割裂、还原主义、分割自然、宇宙机器化和直线性。<sup>[1]</sup>简言之,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人们把机器的构成和工作原理看成是世界(包括人在内,拉美特里便自豪地宣布“人是机器”!)的标准法则。众所周知,机器是由各种可以独立存在、可以随时更换的零部件装配而成的,一个部件的损坏或缺失尽管会使整台机器的功能受到影响,但对其他部件的结构和功能并无影响。在机械论的视野中,自然就是一部由各部分组成的巨型机器,可以像拆卸平常的机器那样拆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和改造。当然,对自然这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人类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只能是从认识部分、表面、实体到认识全面、内部、关系的逐

步深入的过程。从古代文明发展到现代文明的过程,在知识形态上,就是从“自然哲学”走向各门具体科学;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从直观整体走向把整体分为各个部分、分别加以研究的过程。机械论的思维方式相对于古代直观整体的思维方式来讲,无疑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必须看到它并不是认识自然的完善方式。自然本是由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生态的、地质的等运动形式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就相应地有物理、化学、生命、生态等不同的层次,或者说有不同层次的自然规律。而以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为内核的现代技术以对自然的物理化学过程的认识为基础,它的建构机理是通过分裂、分化、分解、分割的方式将复杂的自然事物变为单纯物,然后又将这些单纯物重组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复合物。这样的技术方式,无视技术存于其中的自然界的全貌,只利用了自然某一方面的规律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但因为它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方面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便对这种机械论思维方式深信不疑。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恩格斯就提醒世人注意这种思维方式的危险性:“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

【收稿日期】 2005 - 03 - 28

【作者简介】李世闻(1971 - ),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基础课部讲师;  
谢先江(1968 - ),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sup>[42]</sup>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20世纪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不是减缓而是加重。

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也早在1950年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批判了这种“分割”自然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在于它的促逼(Herausfordern)特性。支配现代技术的这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sup>[43]</sup>。所谓促逼,实际上是迫使事物进入非自然状态的展现。现代技术一直在促逼自然,迫使事物进入非自然状态。例如对土地的促逼已使得过去的田野耕作变成了现行的食品工业。通过煤、石油、各种金属的开采这种形式的促逼,土地被展现为油田、煤区或矿山。现代技术这种促逼特性的基础是对自然的摆置(Stellen)。所谓摆置,就是从某一个方向看待某物,取用某物。在现代技术中,人们只从技术的需要去对待自然,把自然界摆置在某种技术的需要上,如把自然当作物质能量的供给者。空气被摆置来生产氨料,土地被摆置以生产石油、煤、矿石,矿石则可以被摆置用来生产钢铁,更进一步,钢铁可以被摆置生产坦克、机枪等杀人的工具。人类的技术活动现在促逼意义上摆置自然,自然也因此表现为一种被订造的东西。这样促逼自然和摆置自然就成了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所有的事物都有被汇入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们存在的惟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sup>[44]</sup>

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发出这样的哀叹:“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sup>[45]</sup>在资本的逻辑中,一种产品,只要有需求的市场,只要物理化学上可行,人类就该毫不迟疑地把它实现出来。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譬如,核武器在理化上是可行的,于是人类就造出了足以毁灭地球数次的核武库;木材可以用来造纸,于是每年就有数百万亩的原始森林被砍伐用来造纸。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这种极其片面的观念越来越普及,已发展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在这样的技术方式下,人们的技术实践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的统一,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使得自然过程难以用感官和经验去感知和体验。

值得庆幸的是,系统思维方式已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机械论思维方式的现实途径。一般系统论早就指出:系统不是各个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元素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整体。元素的功能并不是完全由其自身决定的,而是要依赖于整体的存在状况。系统的动态性特征表明系统内元素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即刻完全显现出来。系统越复杂,完全显现的时间就越长。对于自然这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我们必须超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在关注部分的同时,更关注部分之间的关系;在看到实践活动的即刻后果的同时要想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后果,从而达到

对自然整体的、动态的深刻把握。换言之,我们必须用系统的、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这样自然才会向人展现出它极其丰富的内涵和让人敬畏的伟大。

## 二 从控制自然走向尊重自然

与作为工业文明的主导思维方式的机械论思维方式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不同,<sup>[46]</sup>工业文明的核心思想——人与自然分离并力求控制自然,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米利都的泰勒提出了看似简单的“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命题<sup>[47]</sup>,这实际上宣告了人类主体性的确立和人与自然原始同一状态的结束。自此人和自然严格地区分开来,西方走上了对自然采取客观研究的道路,发展了自己的科学和哲学。普罗太戈拉更明确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sup>[48]</sup>人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养育了人的自然从此成了与人对立的東西,成了人们征服的对象。

进入中世纪以后,尽管欧洲的科学进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但这种控制自然的思想却因与基督教教义相符而得到保存。作为西方文明的另一源头的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与古代世界的泛神论的原始宗教有着根本的不同。犹太——基督教宣扬“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从外部统治自然的思想。据《圣经·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了世间万物,并允许人类自由处置他所创造的万物,允许人类按其愿望去利用它们。对此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上帝在创造了人之后,便规定了“物和生物除了为人服务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使命;按上帝样子创造的人,被赋予为了自己的物质需要利用自然的使命,即主宰一切的上帝给了人类统治自然的特权。莱斯曾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圣经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正是这个权力因素将人从其他被创造的东西中分离出来。

经过文艺复兴,人类恢复了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和信心,更加大胆地表达了驾驭自然的决心。培根从唯物主义路线出发,论证了人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规律,由此人可以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他指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并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sup>[49]</sup>唯理主义者笛卡尔则认为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也说出了自己的名言:“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黑格尔更是明确指出自然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理性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样人的理性就被提升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这样,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开而正当”地控制、支配自然的思想就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导思想。孕育了人类的自然现在是丝毫不具有自身的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的有用性。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思想家亨利·大卫·梭罗就哀伤地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sup>[10]</sup>

“控制自然”尽管在时间上远早于机械论思维方式,但在逻辑和核心旨趣上与机械论思维方式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卡逊曾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sup>[11]</sup>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强调与自然分离，彰显人摆脱了自然力的奴役，突出人能主动生活的能力，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人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深化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相反是简单化地把与自然分离推向极端。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悲愤地指出：“贬低自然的价值而提高人类的价值无异于用假币做生意。这样的做法导致了一种机能失调的、独断的世界观。因为我们错读了我们的生命支撑系统，我们变得不适应这个世界。”<sup>[12]</sup>“把自己设想成独自生活于一个空荡荡的世界，并不能增加我们的高贵。认为自然不能产生价值的教条实在是有害而无害的，因为它将人类抛入意义虚无的深渊，抛入一场认同的危机，并使得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枯燥无味。”<sup>[13]</sup>只有超越“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认识到人类周围并不只是一堆客体，而是一群主体”<sup>[14]</sup>，认识到自己是自然大家庭中最聪明的一员而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的天外来客，确认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人类的行为才会有彻底的改变，与自然的和谐才可能真正实现。确认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在传统观念看来，是把人降低到物的位置因而是人类的耻辱。然而正如罗尔斯顿所言，“人类并非在一个毫无价值的自然舞台上演出附带或实现价值的戏剧。人类的舞台是孕育了人类的子宫，而且人类实际上永远也不会离开这个子宫。”<sup>[15]</sup>我们认为人类超越自己习惯了观念，走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正如当年人类承认自己的祖先不是神而是古猿一样，不是使人类蒙辱而是更加彰显了人类的伟大。

应当指出，确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人只能束着双手静坐在自然中，不能对周边的环境做出任何的改变。自然的价值存在于个体中，但更主要地存在于物种和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整体之中。食物链是自然的天然法则，为了生存，人类必须以植物和动物为食物来源，或者说人类的生存是以牺牲身边其他物种个体的生命为条件的，这并不是对自然价值的否定。由于食物链而产生的个体生命的死亡是自然生生不息的内容之一，不会在短时间内造成许多物种的灭绝，使得自然走向混乱和无序。自然有着自己的再生能力，只要人类的活动在生态规律的限度内，就不会造成对自然整体的伤害。

我国有着“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但应当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众一直都有着很强的生态意识。事实上，道家和儒家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是不同的。道家的“天”是自然的“天”，道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回归自然，确实具有很高的生态关怀，但道家思想在汉朝之后并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两千年中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那里，“天”主要是人格化的天。儒家的“天人合一”主要是人际伦理关照。当然也应指出，儒家思想并不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学东进、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旧民主革命，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逐渐变成了来自西方的思想而不再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在建国早期，我们更是要“向地球开

战”。在“拨乱反正”之后，又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普遍作简单化的理解，把发展与经济增长甚至是某个经济指标等同起来。西方“支配自然”的观念经过百年的传播，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 三 从消费主义的“物质至上”走向“精神至上”

与一般动物本能地延续生命不同，人在维持生命的同时，还在寻求活着的意义。因此，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人生的意义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不可能去思考很多人生的意义问题。不解决物质生产问题，人生意义问题也无从谈起。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生的意义问题就日益凸现出来。在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赢得西方民众虔诚信仰的基督教告诉人们，人生的意义在于信仰上帝，救赎灵魂。但基督教的统治并没有使得社会的物质生产有多大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远非衣食无忧。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大声喊出：“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彼得特拉语）<sup>[16]</sup>，肯定了人的世俗生活的价值，倡导一种追求个性解放、享受世俗快乐的人生哲学。这实际是人从自己制造的偶像的压迫下第二次解放出来的独立宣言，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的。这种号召人们将关怀的目光从天国移至人间的人本主义在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惟一天命的资本的魔力之下，逐渐演变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在费尔巴哈指出上帝是假相、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反而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上帝，“他人是地狱”（萨特语）。这样现代人就只能通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使用来证明自己上帝。

日本著名学者界屋太一曾指出：“自从中世纪末期起，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历史。它的价值观念及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都是和增加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sup>[17]</sup>现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快速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由其决定的人们的利己主义、财富第一、享乐至上的价值取向互相促进，构成了一个坚固无比的“思想牢笼”，这使得社会成为吞噬自然资源的巨大“黑洞”。美国学者艾伦·杜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sup>[18]</sup>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求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sup>[19]</sup>一个司空见惯但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在作为环保运动发祥地的美国，在环保运动开展了四十多年的今天，市场上销售的家庭轿车绝大部分是1.6升以上的型号，而不是他们倡导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的低排量汽车（见英文雅虎网站“www.yahoo.com”中的“auto”栏目）。按照这种物质消费至上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人生的价值和幸福就在于能消费越来越多的高档物品和娱乐。而所谓的高档物品，就是消费大量物资而制成的产品。马力很大的轿车被称为高档轿车，冷暖设备齐全、装修

豪华的住房被称为高档住房。拥有和消费大量物质财富的人是富翁,受到社会的尊敬和羡慕。

著名人道主义思想家弗洛姆(Erich Fromm)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醒人们,一个幽灵正向我们走来,它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已被转变成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人,作为生产机器上的一个嵌齿,已变成了一个东西,而不再是人。他花大量的时间做一些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与他不感兴趣的人,生产一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而在他不生产的时候,他就消费。人的被动性是人在当今工业文明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心理特色。他接受,他被供给食物,可是他并不消化他的食物。然而,人的被动性只是他的总体综合症的一个症状,这个总体综合症可称为“异化综合症”。因为人是被动的,他就不再与世界发生积极的联系,被迫屈从于它的偶像和它们的需求。因此,人总是感到无力、孤单和忧虑。”

德国学者孙志文(Arnold Sprenger)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指出,今天是有史以来人类头一回除了他自己和自己的产品以外无所以对。科技时代的人不再和自然作获益匪浅的对话,他只和自己的产品作无意义的独白。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人和自然疏离到这样的程度:人即使是回到自然中,面对自然的美景,人仍然摆脱不掉都市的影响,仍然停留在疏离、无聊、挫折、恐惧之中。现代人与自然疏离的同时,还在不断地与同伴疏离。在盛行个人主义的地方,强者把一切归于自己,整个社会和个人对于他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人和价值全被抹杀了。然而在集体系统当中,看重的只是个人对集体的贡献,个人仅仅是集体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完全被视为可随时更换的零件。人性的因素只在有利于集体的时候才被考虑和照顾。结果是真实的人性感情被冻死;无情的手腕或功能主义控制每日人际交往;个人较深远的期待和个性的表达被窒息,人和同伴无法有真实的相遇。人们互相漠视,只关心自己的所得。现代人生活在千篇一律、密密麻麻的、弥漫着一股股冷漠的钢筋水泥构成的建筑之中,彼此挤在一起生活,却不相识,普遍的孤独,找不到诉说心事的对象。现代人不再向世界开放自己,因而孤独、焦虑和恐惧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基本特征。<sup>[20]</sup>

我国学者卢风也明确地指出:“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对意义的追求就是对无限的追求。人是一定要追求无限的,或者以精神追求的方式追求无限,或者以物质追求的方式追求无限。传统文化引导人们以精神追求的方式追求无限,现代文化则引导人们以物质追求的方式追求无限。我们今天轻浮地嘲笑古代人迷信、无知,认为他们追求虚无飘渺的人生目标,其实在对意义的理解上,古人有比我们高明的地方。人实际上只能用精神追求的方式来追求无限,而不能以物质追求的方式来追求无限。”<sup>[21]</sup>

“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已经使得现代人沉溺于物的拥有,德性、情感乃至整个内心世界被严重轻视甚至“荒漠化”。现代人的普遍状态是:信仰缺失,心灵空虚、孤独、恐惧、烦恼、

忧郁、绝望。人一旦陷入这种状态,非理性的欲望往往会自我放逐,将本能的冲动、享乐、实惠视为惟一的真实,从而在自己所造就的生存与心灵的炼狱中承受着二律背反的煎熬。正如海德格勒的惊世之言:现代社会对人最大的戕害不是原子弹(当然不应忽视原子弹的危害),而是人的生存意义的丧失,由此造成对人的本质生命的剥夺。<sup>[22]</sup>

我国虽然文化传统与西方迥异,但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随着外资的快速引进,西方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也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已经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诱发了人们过高的物质需求,热爱劳动、勤俭节约、乐于助人、团结友爱等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事实上,西方人的那种精神虚无的状态已在我国一部分人群中显现出来了。

显然,如果让这种消费主义的“物质至上”价值观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话,对于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现在是在经济还很落后、生态却已遭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和弘扬以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为核心内容的“精神至上”的价值观,把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引导到对自身知识与审美的提升、道德伦理的践行、对生命的关爱与广泛的社会参与上来。这样,不用像狄欧根尼那样的圣贤,普通人在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价值,而不是落入追求更多物质的无底深渊,像浮士德那样到死也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成功。

#### 四 从“增长至上”的发展观走向科学的发展观

在“控制自然”的视野中,自然只是一堆无声客体的集合,是可以随时碎片化的东西。以此观念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工业,本质上就是按照技术的要求,以成本最小化为原则,从自然整体中割取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以改变。工业的出现作为人类的发明,无疑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现代社会在资本逻辑推动下把本该作为增加物质资料的一种手段的工业当成了社会的根本目的,正如英国学者H·托勒在《贪婪的社会》一书中说:“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工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人类旨趣的东西,人的其他任何旨趣和生存物质资料的供应都被忽视。如同一位疑病症患者只是关心他的消化过程,他的整个生活罩上了死亡的阴影,工业化社会在采取各种手段来争夺财富的狂热举动中,忘却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sup>[23]</sup>社会的发展被理解为:更大规模的生产——更高的经济收入——更加幸福的生活。经济增长成了现代社会的最高目标,有着吞噬一切其他旨趣的魔力。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理由竟是如按《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要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增长至上”的发展观,出于经济增长的目的,关心对自然某些方面作越来越深入的探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对自然的整体不感兴趣;重视技术的进步,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加,但认为生产的是能毁灭地球的核武器还是治病的药品无关宏旨;也关注人,但感兴趣的是人的消费能力

和生产技能,在消费时被尊为“上帝”和作为“人力资源”参加生产之外,人就是一个可以忽略其内容的符号。人的精神世界实际上从资本的眼中消失了。这种发展观的“杰作”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环境的严重破坏和人的深度虚无与隐痛。

我国的现代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却几多波折,但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期间,通过工业化来增长经济使人民生活幸福的指导思想一直是很明确的。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等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3.65万亿元(约1.65万亿美元,参见国家统计局的主页),人均收入已接近1100美元。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遭到破坏、贫富悬殊加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这些现象,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我们的发展观不是太合理。众所周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等开创性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总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更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但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许多人不考虑这些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不是从整体上来把握,而是从字面上机械地来理解,把邓小平丰富深刻的思想简单化为几个具体指标的要求。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观念中,有着丰富内涵的“生产力”与“发展”被简化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与GDP的增长,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发展=经济增长=GDP变大=自己的领导能力强=提拔到更高职位的机会,GDP崇拜便由此产生了。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03年GDP增长率为9.3%,但32个省市自治区公布的当地GDP增长率中,29个超过9.3%,27个超过10%,只有3个稍稍低于9.3%,而且还是经济总量比较小的省。<sup>[24]</sup>稍懂数学的人都知道这种差异是不能用统计误差来解释的。可以说“增长至上”的发展观已经成为我国相当一部分人的行动指南,已经给我们的建设事业造成了相当的危害。

我国现在还有上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数千万人还处于贫困之中,甚至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承担不起,因此,经济仍需要较快地增长。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经济增长越快越好。牛津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阿盖尔明确指出,真正幸福的源泉来源于三个方面:社会关系的强度、事业的成就和闲暇的质量,包括对家庭生活尤其是对婚姻的满足,友谊及其他人际关系的满足;有意义的工作,事业的成就感、发展潜能的实现和创造性的发挥等。<sup>[25]</sup>近年来人们的收入快速增长了,但许多人在追逐更多地赚钱和消费中,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家庭关系和团体关系,物质越来越丰富,时间却越来越少,孤独感和疏离感越来越强,并没有感到更多的快乐与幸福。2004年12月13日发布的《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农村人的幸福感反而高于相对富裕得多的城市人,这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sup>[26]</sup>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告诉我们,人对以物质财产为基础的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当它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人们关注的重点就会转向非物质性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如对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据人民银行的数字表

明,2003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000美元。到2005年1月底,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2.22万亿元。按2002年6月进行的我国首次《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户均资产22.83万元。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户均人口为3.1人,这样每户平均的可支配收入为26263元。<sup>[27]</sup>可以说我国已有相当大的人群,他们的物质生活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他们关注的重点已不是收入的更快增长而是良好的生活环境、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更丰富的文化生活、更多的政治参与等。如果人们的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必然要产生更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各个层次的政府在确定发展目标时,必须真正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中央“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真正考虑到群众非物质领域的需要,把普通群众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治安状况的进一步好转、社会诚信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文化设施、更方便的政治参与途径、更高效与廉洁的政府等摆在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也正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创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求。

## 五 从“奢侈性”消费走向适度消费

西方现代经济学告诉人们,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高消费不但不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表现,相反成为身份高贵的象征,甚至被认为是爱国的义举。当物品消费受到人的生理条件限制时,就转向各种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因此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快速废弃就成为现代社会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发达国家的消费观的一大特点是“时尚性”。在本来意义上,消费是为了满足需要,因而是对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消费。因此可以说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其消费价值,使用价值是衡量消费价值的尺度。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衡量一种消费品的消费价值的尺度不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时尚价值”,这样人们消费的已经主要不是该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传媒制造出来的“时尚”。我们知道,物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其客观特性决定的,而时尚却是人们主观的社会心理,是可以透过媒介无限制地制造出来的,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时尚消费的基本特点是非生存需要性、短暂性与无限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时尚消费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也不仅仅在于享乐,而主要在于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力、地位和身份。因此,这种消费实质是要向社会观众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他们的羡慕、尊敬和妒忌。”<sup>[28]</sup>与此相适应,消费品的生产越来越追求豪华,产品更新越来越快。

西方现代社会消费观的另一大特点是让人越来越不用力的“方便”,与此相对应,用完即扔的一次性用品大行其道。提供“用过即扔”的方便的各种包装已成为西方各国堆积如山的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美国的食品包装达到了城市固体废物的1/5。为了服务于罐装饮料爱好者,全球每年制造和扔掉了至少2万亿个瓶子、罐头盒、塑料纸箱以及纸制杯和塑料杯,而制造这些容器消耗了大量金属、玻璃、纸张和塑料。这种“方便”其实只是对使用者本人的方便,给社会

和其他人带来的却是不方便,造成资源的巨大损耗和环境的巨大破坏。据联合国发表的《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占世界人口 20%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拥有世界总收入的 64%,消耗了世界上 70%的能源,消耗了地球上 40%—86%的各种自然资源。发达国家居民能源的平均消费是发展中国家居民能源平均消费量的 3倍,他们的淘汰消费等于发展中国家的 3 - 8倍。作为现代发达国家的消费观的两大特点,方便性和时尚性都是以资源的巨大损耗为条件的,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看,这种消费观是非常奢侈的。

尽管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刚过 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还有着巨大的差距,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商业模式趋同,发达国家的消费观念在我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被其同化,尤其是城市的年轻人这个群体。我国是豪华汽车、高档时装、高档化妆品等大部分“奢侈品”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上万元一桌的酒席经常见诸报端。移动电话的普及速度让美国学者罗尔斯顿惊叹不已。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洋快餐店经常是人满为患。一次性的泡沫快餐盒、卫生筷、塑料袋等在民众中广泛使用。人们消费观念的这种改变值得我们警惕,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将造成更大的生态危机和更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鉴于我国是十三亿人的人口大国,人均资源贫乏,现在还有上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更有必要坚持适度消费的消费观,走绿色消费之路。

适度消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是一种健康、理性、有节制的消费。人们基本的生存性需要应以满足和发展,对非基本的享受性、追求时尚性的需求应有所限制,对奢侈、浪费性欲望要严加遏制。不反对随着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提高消费,但是不主张无限制地物质增长,强调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协调发展。其次,它是一种生态型消费,是以地球承载能力为限度的“绿色消费”。它要求人们在生态原则基础上以对其他物种和地球产生最小影响的方式来生活,提倡使用那些既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又和自然环境协调一致的“绿色产品”(是指那些在生产和使用对环境对人体健康无害、在消费周期终结时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产品)。再次,它是一种均衡性消费,要求人类代内之间和代际之间的消费公正。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缘故,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收入较高,现在就应该比西部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到适度消费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 【参 考 文 献】

[1][6]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东方自然观与科学观的发展[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4-35,440.

-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4.
- [3][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M].孙周兴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2-933,934-940.
- [5][11]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1,262.
- [7][8][9]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54,345.
- [10][21]卢风,刘湘溶.现代发展观与环境伦理[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9,5.
- [12][13][1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92-193,197,198.
- [14]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34.
- [16]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61.
- [17]界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M].金泰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33.
- [18]艾伦·杜宁.多少算够?[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 [1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68.
- [20]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M].陈永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67-84.
- [22]顾智明.论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J].人文杂志,2003(1):149-153.
- [23]转引自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220.
- [24]定军.国家统计局建立联审制度终结地方GDP统计虚高时代[EB/OL].新华网,2005-01-30.转载于263在线(www.263.net).
- [25]王建辉.论重建“适度性”消费伦理观[J].社会科学辑刊,2003(1):56.
- [26]陈娉舒.平静满足的心态在居民中占主流[N].中国青年报,2004-12-14.
- [27]许小年.土地神话 卖一个上海可换大半个美国[N].明报,2005-03-07.
- [28]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0.

(责任编辑 董 华)